

我的大学
1948-1953

我的大学
1948-1953

春风渡

董贻正 薛传钊 著

1949，中国大学生群像 / 在烟火与战火中，横渡璀璨年华

我的大学
1948-1953

我的大学
1948-1953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& Economics Press

春风渡

董贻正 薛传钊 著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& Economic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风渡/董贻正,薛传钊著. —成都: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,2015.8
ISBN 978-7-5504-1979-7

I. ①春… II. ①董…②薛… III. ①清华大学—校史—史料
IV. ①G649.2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37252 号

春风渡

CHUN FENG DU

董贻正 薛传钊 著

责任编辑:王 艳

助理编辑:涂洪波

封面设计:何东琳设计工作室

责任印制:封俊川

出版发行	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(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)
网 址	http://www.bookej.com
电子邮件	bookej@foxmail.com
邮政编码	610074
电 话	028-87353785 87352368
照 排	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郫县犀浦印刷厂
成品尺寸	152mm×225mm
印 张	15
字 数	165千字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4-1979-7
定 价	35.00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

目录

一路向北

- 我们当年考大学/006 马桶上听到被清华录取的消息/008
- 一路向北/009 来到北京，来到清华园/011
- 1949年的清华/013 国府末日/019
- 清华的学习生活和我的老师们/021 清华特色/028
- 特殊背景下的社团“团契”/030 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/034
- 国民党走了，共产党来了/035 参与迎接北平解放/041
- 三次申请入党/047 在清华园参加的政治运动/052
- 在毕业证书上盖章的两位校务委员会主任/059 我们这个班/062
- 毕业奔赴东北/066 重返北京/074
- 用土办法来测算所需各类专业人员的比例关系/076

学于天地间

奔赴解放区/083 穿越封锁线/085 燕京一年/087

翦伯赞教我中国社会史/092 体育和音乐史的陶冶/094

燕京的课外生活/097 参加开国大典/099 到京郊参加土改/102

转学去清华/109 清华的学风与校训/112 大学有大师/113

马约翰教授的体育课/118 课外的锤炼/120

多才多艺的清华学子/123 孙晓邨、张君秋和乌兰诺娃的指导/126

到印度大使馆借服装/128 去广西参加土改/131

董必武送行土改团/134 土改前奏/140

进驻山区“土匪村”/143 土改那些事儿/156

邕江江畔的彩虹/166 第一次参与“战地手术”/170

一只掉出来的眼球/171 从看摊到接生/173 团部工作剪影/177

向知名的人民艺术家学习/181 张定和的委屈/183

同安娥和田汉的接触/184 巧遇诗人艾青和作家李又然/185

丰收中凯旋/190 毕业前/191

骑河楼老校舍和皂君庙新校址/193 系统学习计划经济/195

新式“国家毕业考试”/199 弃读研究生，争去第一线/202

分配、烧饼与苹果园/204

后 记/207

一路向北

董贻正

我于1931年12月出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宁波。

我父亲23岁时，就任董洪茂颜料号代经理，直到32岁。董洪茂的老板是我堂伯父。我父亲27岁那年，经朋友介绍，兼任美商恒信洋行的染料销售员。

我父亲工作过的恒信洋行是美国杜邦化工垄断集团开设的。恒信洋行的业务之一也是染料。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董洪茂颜料号。就是在这家颜料号的试验间，试制成功了硫化元青染料。在我印象里，董洪茂只不过是一个做染料买卖的商店，但想不到它居然还有一个试验间，而且还居然试制成功硫化元青染料。这件事究竟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，我只是从公家在父亲的悼词中看出了一些端倪：“董先生年轻时即具创新精神。1922年在董洪茂颜料店的试验间试验制作成功染料硫化元青成功。”这件事确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，也可以看到当时民营企业的活力。

直到1932年，我父亲才同几位亲朋好友合资，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染料企业之一——大中染料厂”，所生产的硫化元青染料，被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为首创国产染料，免税通行全国，从此改写了硫化元青全部依靠进口的历史。在大中厂，他任常务董事兼营业主任。后来我父亲又投资开设了信中染料行和中一染料厂，生产硫化元毛皮染料、酸性金黄及偶氮染料等产品，他出任经理。在上述的悼词中，称他为民族染料工业的“开创者和奠基的老前辈”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由于大中染料厂不在租界，因此被日军所占，日方强迫我父亲与日商“合作”。我父亲因为笃信儒家教义，“威武不能屈”的原则已成为他的信条，自然托词拒绝。日军恼羞成怒，派出警卫队搜查他的办公室，虽一无所获，但仍借故将他拘押于日军江湾司令部，10天后始获释放，而大中染料厂则未归还。

从我出生开始，一直到上大学之前，都生活在上海的租界里。

1936年8月上小学，当时在上海，凡是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早。我上学较早，不到5周岁就进了小学，我哥哥也一样。现在有种说法，小孩上学太早了，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。从我们兄弟的经历看，这一说法似乎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。我从小学到大学，在班上都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。

而且，那时候的租界里，对于学生的入学年龄似乎也没什么限制。我上的是大沽路振西小学，学校离家很近，大约1里多的路程。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。我个人也面临一个大问题的选择：小学毕业了，到底上哪所中学？

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是南洋模范中学（简称南模）和上海中学。上海中学原址不在租界，日寇入侵后，已经停办。南模创建于1901年，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。他们培育出许多杰出人才，邹韬奋就是其中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南模毕业的就有37人，包括物理学家、哲学家何祚庥，氢弹、原子弹功臣唐孝威，计算机专家、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，以及水利专家张光斗等。

最终，两个都不是很合心意。有一天，我走过福煦路（现名延安中路），看到致远中学招生广告中说：考试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学杂费。我觉得可能不错，于是就报了名。不记得有什么入学考试，可能是凭小学成绩单就入学了。

中学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阶段，尤其在那种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人。

由于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，我逐渐接触了进步思想，平时言论中也有所流露。当然这使校长和教导主任很不满意。那个学期的“公民”课，就是以蒋介石的《中国之命运》为主要内容，这是1943年由陶希圣根据蒋介石授意写成的。那时，国共两党虽然交恶已久，但一些进步书刊仍可以公开发行，我还在“生活书店”（邹韬奋创办，今“三联书店”前身）买到过香港出版的有地下党背景的《华商报》，上面经常刊登内地封锁的消息，至于通过地下党流传的书刊，也不胜枚举。我就看到过陈伯达所写的《评〈中国之命运〉》。那个学期，“公民”课的大考，要求写一篇《中国之命运》的读后感，我就把陈伯达的观点写了进去。现在记不得当时写了什么，但肯定是对“蒋委员长”大不敬

的话，这当然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举动，于是我从一个历届都是“品学兼优”，一贯都是校长、教导主任心目中的好学生，一下子就成为“赤化分子”了，“操行”降为“乙等”。就是在这种氛围中，我离开了待了3年半的致远中学。

离开了致远，我考上了沪新中学。沪新中学实际上是上海中学的替身。上海中学停办后，该校的很多老师都转到了沪新。在沪新，学期尚未过半，我却因病休学，一则身体不好，二则突然产生一种厌学情绪，觉得学校教育没意思，就借口身体不好休学了。本想索性通过自学后，以同等学力考大学。直到新学年开学时，我才决定还是上学为好。这时，很多学校已经开学。我在霞飞路（淮海中路）看到晓光中学，晓光中学是经教育部特准立案的学校，觉得能同教育部挂上钩，说明该学校还是有一定水平的。于是，我就在1946年9月报名入学，学校已经上课了，教室座位都已排好，最后一排还有一个空座，我刚好补这个缺。

晓光中学是一所党派色彩比较浓的学校。这从该学校两位主要领导的身份就可以看出。他们对进步学生运动采取压制政策。据比我早一年入学的老同学讲，1946年蒋介石60大寿时，教导主任用了整整一节课，大讲特讲蒋介石的“丰功伟绩”，平日还在课堂上推荐一些反共反苏的小说和书籍，还公开号召同学们去参加反苏游行。他们对进步学生运动采取压制政策，学生要参加“反内战、反饥饿”等反对国民党的游行时，则紧闭校门、不让出入。我去前，已经开除或逼退几名进步学生。

但晓光中学也是地下党力量比较强的学校，而且集中在我们班上，我入校时有3位，我们毕业前又发展2位，一个不到50人的

班级，居然有5位地下党员，比例超过10%。对比清华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地下党员公开时不到200人，就师生员工的比例而言，我们晓光中学这个班不比清华低。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，我们班形成了一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队伍。应该说，在晓光求学的两年（1946年9月—1948年8月）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在晓光，我不仅停留于接触进步思想，而且参加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实际行动。但校方的高压，也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影响。在斗争激烈时，我也曾有过动摇。最后在陆剑初等党员劝说下，我还是参与了这些活动的领导工作。对像我这样出身的人，不革命，生活照样可以过得很好，前面就是一条大学——出国留学的道路。但在国民党的统治下，贪污腐败成风，民生凋敝，个人又会有什么出路？作为有正义感的青年学子，迟早是会走上革命道路的。

我们当年考大学

新中国成立前考大学招生不是全国统一的，而是各校单独或数校联合招生，考试时间错开，据说一个暑假最多可以报考7所学校。录取名单都在报上公布，常会看到一些重复的名字，那就是被多所学校都录取的优秀生，这种考试和现在很多美国大学的考试制度相似。如果一个学生被多所大学录取，那么自然会有亲朋好友出谋划策，甚至也有一些已经考进大学的学长建议考生选择某个学校，感觉就像是生源的争夺战，学生有权选择自己想

上的那一所；同时，各高校为解决录取后学生不能全部报到的问题，各校都有备取生，以备递补。

当时，我报考了3所大学。

一所是上海交大。上海交大不仅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，而且在全国工科院校中也是名列前茅的。1956年国务院决定上海交大搬迁到西安，于是就有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之分了。

另一所是南京的中央大学。对中央大学，其实我是不感兴趣的。因为我觉得这是党派性特强的学校，蒋介石就曾一度兼任该校校长。

我早就向往清华的学术风气和“民主堡垒”的自由民主精神，我的第一目标就是清华。清华是同北大、南开联合招生的，大约因为这是西南联大的老班底，但只报清华，未免显得孤注一掷，因此我还报考了上海的交大和南京的中央大学。

报考中央大学，是有些出于礼节。因为有位高我一个年级的晓光校友，他上年考上了中央大学，他力劝我报考。但从我内心来说，这三所学校中，我最不愿意去的是中央大学。因为觉得中央大学是南京国民党的根据地，党化教育思想太重。据说这次入学考试题中有一道地理选择题就是测试你的“赤化”程度的：苏联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比例是多少？选项有1/6、1/16等。凡是答对的，就有“亲共”的嫌疑。我这道题恰恰答错了，选了1/16。

至于报考哪个系？我都填写电机系。其实，我对化工还较感兴趣，但由于我父亲的行业是属于化工的，因此，为表示自己不愿继承家业，坚决不报化工系，也是背叛家庭的一种表现吧。为

什么选择电机系？当时因为听说清华、上海交大的电机系最强，也最难考。难，我就偏要考，结果这三所学校都考上了，更有些志得意满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是一种非理智的选择。

马桶上听到被清华录取的消息

我是在家里我房间的马桶上听到自己被清华录取的消息的。那时上海很少有人家里用抽水马桶，所以在旧一些的小说里，媒人说亲，讲述一个人的家庭条件就会说“伊屋里有抽水马桶的”，抽水马桶成为一种财富和社会富有阶层的象征。有抽水马桶的房子主要集中在租界里，但是并不代表租界里的每个家庭都有抽水马桶，我们家在英租界成都路，就没有抽水马桶。

没有抽水马桶怎样解决这一项“人生大事”？这就凸显了旧时候的“马桶”文化了。马桶在过去是一项很重要的生活用品，在很多地方，女儿出嫁时的陪嫁中有一项就是马桶，还要求用红漆漆好。一般的家庭里的马桶可以用木头做的，当然木头也会分三六九等，柳木、松木和红木也各不相同，条件好的或者讲究的人家，则有漆器的马桶，甚至铜马桶、金马桶。前些年有一些报纸上会说到“黄金浴室”“黄金马桶”之类的新闻，感觉是这种马桶文化的遗风。我爸妈在楼上用的马桶就是用红木做的，我房间的马桶就简单些。

一般都是在房间里放一个马桶，现在好像有些不可思议。不过，那个时候是很正常的一项生活内容。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

在南方一些城镇的生活镜头里，仍旧有早上到河边刷马桶的生活场景。

我小的时候，每天清晨天不亮，弄堂里就响起了叫唤倒马桶的声音，家家户户提着马桶出去，倒在粪车上，再用水洗刷马桶后提回来，这也算是旧上海一道颇有特色的风景线吧。

那天，我正坐在马桶上解手，听到爸爸叫我，说是清华发榜了，我考上了。

我并没感到特别兴奋，多少有些“早就料到”的意思。请他把报纸给我，在电机系一栏里，找到了我的名字。过几天，上海交大、中央大学也先后发榜了，都有我的名字，后来正式的录取通知书也寄来了。父亲还托人去上海交大打听我的分数，说是360多分，当时算是高分了。

一路向北

从上海到北京，那时最便捷的路线自然是走津浦线。当时全国仅有几条铁路主干线，南北的是津浦线、京汉线，东西的是陇海线。但是，当时的津浦线并没有解决“横跨长江”的问题。所以，从上海乘坐火车，到南京下关，整列火车要上轮渡，火车解体成三截，过江后再还原。1948年，国共战争激烈，津浦线被切断，无法通行，从上海到北京只能先坐船到天津，再乘火车到北京。这些事都由高年级返沪同学组织的“北上同学会”来操办。从上海到天津，只有两艘快轮：一艘是我们乘坐的“锡麟号”；

另一艘是“秋瑾号”，这是纪念反清志士徐锡麟、秋瑾的。两人都是绍兴人，徐锡麟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，被凌迟处死，时年35岁；秋瑾被砍头，时年31岁。但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这样的“反清烈士”竟被视为“牛鬼蛇神”而被挖坟弃尸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在西子湖边重建秋瑾墓，并以汉白玉塑造秋瑾像，并镌刻有孙中山的题词“巾帼英雄”。

虽说是快轮，但全程也要48小时，我们学生都是买的通铺，没有床位，就是在甲板或过道上打地铺。老同学早告诉我们，说是过黑水洋时，风浪特大，很多人都会扛不住而呕吐的。所谓黑水洋，就是黄海北边的那部分。黄海由南向北，因其含沙量及海水深浅的不同，分呈黄、绿、蓝等不同颜色，黑水洋在黄海北部，海水较深，水呈蓝色。果不其然，到了黑水洋，我们很多同学都吐了。

到天津后，我就住在南开大学。南开是老教育家张伯苓于1919年创办的，抗战时同北大、清华一起组成西南联大，张伯苓和蒋梦麟、梅贻琦是西南联大3位常委。张伯苓是周恩来的老师。抗战时，张伯苓站在中间立场，1948年还曾担任国民党的考试院院长，为毛泽东所不满。新中国成立时，蒋梦麟、梅贻琦都离开了大陆，但张伯苓留在了大陆。但南开校庆时，竟拒绝这位创办人回校，可以想象老人当时的心境，也可以看出当事人的胸怀。他1951年2月23日病逝于天津，周恩来同志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，向校长遗体行礼默哀，慰问了张师母，表示自己很遗憾没能早点来，又说道：“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，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。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

是进步的、爱国的，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，有功于人民的。”

那时不像现在的大学，不仅有招待所，还有星级宾馆。学生上学，没听说过还要家长陪同护送的。我们到了南开大学，按照指定的教室，把课桌拼起来当床，打开自带的铺盖，睡了一夜，第二天坐火车去北京。

当时解放战争战场局势已经很明朗了，其实早在1947年3~5月孟良崮战役后，战场的形势就已经改变了。是役，国民党组成3个兵团共约45万人，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，结果被全歼，全副美械装备、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74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。到了1948年夏，国民党在各个战场都是节节败退，津浦线的一些城市也被人民解放军攻克。但是不知道国民党是真不知道实际情况还是故意自欺欺人，在国统区总是宣传国军取得了哪一个战役的胜利，战场的宣传上也有很多这种自己都不知道信不信的宣传方式。铁路两侧，见到不少“华北剿总”刷的标语，真是杀气腾腾，什么“杀朱拔毛斩贺龙”，什么“打到石家庄，活捉聂荣臻”，火药味特浓。从表面看，似乎士气高昂，实际上只不过是掩盖自己的心虚。几个月后，三大战役打响，国民党一退再退，最终退到台湾这个孤岛上去了。

来到北京，来到清华园

现在的北京有很多火车站——南站、西站、北站、东站，每个火车站都很大，而且人满为患。其实，新中国成立前，北

京的火车站主要是前门火车站，还有建于1906年的西直门火车站，清华园也有一个车站，入口处的匾额还是张天佑于宣统二年题写的。

我们的火车到了北京，在前门车站下车。前门火车站始建于1901年，当年的全称为“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”，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。它曾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，如1905年的“刺杀五大臣”事件。是年9月24日，辅国公载泽、兵部侍郎徐世昌等5人奉命出洋考察，革命志士吴樾携炸药混入车站，炸伤数人，以致这个考察团被推迟出访。1924年10月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推翻曹锟政府，就是在这里安营扎寨的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500名北平学生组成的“南下救国示威团”也是从这里出发的。1959年，新的北京站落成投入使用，前门火车站结束了历史使命，后来改为铁路工人俱乐部。20世纪末由香港鹏利集团开发，在原址处修建了老车站商城。

现在看来，前门火车站规模跟现代化的火车站简直没法比，但是那个时候，火车站就算是很巍峨的建筑了。到了北京站，就有清华校车来接，一路还是很顺利的。

那时候的北京可不像现在这么热闹。校车经过处，行人不多，车辆更少。出了车站，就见到正阳门，高高的城楼，煞是雄伟；经过天安门，里面就是四朝古都皇帝陛下的宫殿，使人肃然起敬。金水桥前一排排树木，从根部到离地面一米处都刷有石灰，煞是整齐，这在上海也是没见过的。途径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，这是明朝的建筑。三间四柱三楼式的木牌楼，矗立在路中央，倒是够气派，好在那时车马稀少，也妨碍不了交通。不过，